

钟祥财 著

心中的约定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钟祥财 著

心中的约定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中的约定/钟祥财著.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520-0993-4

I. ①心… II. ①钟…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96845 号

心中的约定

著 者: 钟祥财

责任编辑: 缪宏才

封面设计: 黄婧昉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照 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开

印 张: 7.25

字 数: 141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0993-4/I·166

定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书 里 书 外

孟子何以惹恼了朱元璋?	3
上海的经济学家	7
也谈经济学的“流”和“派”	14
走近亚当·斯密	21
从盐业腐败说到清朝的“陋规”改革	26
于混浊中留清白	31
尊重差异,包容多样	36
萧条岁月读《萧条》	41
和学生谈读书	46
从“维齐非齐”说起	49
萨伊是对的!	52
供给学派“浅薄”吗?	56
补记叶元龙先生	63

严复的远见	67
拉弗曲线与社会常识	70
再谈常识	73
点睛之笔	75
资源垄断是创新的致命障碍	77
低调	82
读方孝孺的《深虑论》	84
格林斯潘的傲慢说明了什么?	86
美国人品尝“凯恩斯苦果”	90
灵魂的冒险	95
倾听科斯	99
由欧债危机想到赤壁大战	101
准备提案有感	105
孤独的杰文斯	107
从市场经济角度看“打车软件”	111
有安全感是一种境界	113
油画《南来北往》应为王利国所作	116
我们愧对蓝天	118
莫奈让有些人难堪	120
己所欲,勿强与人	123
近代学者论中国古代财经改制	125

岁月留痕

妈妈的冻疮	137
-------------	-----

说一声“对不起”	139
严姐	141
怀念朱伯康先生	144
经济所的前辈们	149
一碗炒青菜及后续故事	153
心中的约定	156
记忆中的乡镇企业	160
当工人的日子	164
冬夜记事	168
跑小菜场	174
看小书	179
暖暖的立夏	183
在美国感受对儿童的关爱	187
马茂元先生的名气	194
听无线电	197
调房子	202
铭记岁月 感受温馨	206
那一场联欢会,那一个被困夜	208

附 录

相信思想的力量(赵玉蓉)	215
--------------------	-----

书里书外

孟子何以惹恼了朱元璋？

历史学家朱维铮在《传统文化与人文素质》的演讲中提到：当年朱元璋读到《孟子》里的几段话，“不禁暴跳，要把孟子赶出孔庙，最后虽然没有实行，仍然下令删了《孟子》中的八十多节，明初的科举考试用的都是这本《孟子节文》。”朱维铮举的例子是《孟子》中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语，正是这种“批判精神”，“使那些将国家视为个人私产的专制暴君恼怒”。（《中国大学学术讲演录》）其实，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孟子让专制统治者不高兴的观点还有很多，例如，他提出“王，何必曰利”，就是反对政府直接参与牟取经济利益的事务；他认定“有恒产者有恒心”，就是呼吁让老百姓有基本稳定的财产，因为这是使人民安心生产和生活的根本所在；他主张正经界，在一定程度具有明晰物产使用权的意识；他批评“垄断”是“贱丈夫”行为，指出这是通过把持有限的优越地形“罔市利”（在《孟子》中，“垄断”一词的直接意思是商人抢先登上市场上的高出地段，以获取更多的交易信息）；等等。如果再

把考察的视野放宽一点,则先秦哲人提出的法自然思想,诸子对人类求利本性的描述,司马迁“善者因之”的自由放任理念,都已经透露出“前科学”的智慧之光。问题在于,这样的先行思想资料并没有结出丰硕的经济理论之果。

究其缘由,后代帝王和御用文人对先秦思想进行“修理”是一大原因。从本质上讲,市场经济以个人的自由选择为特征,产权制度即为保护这种个人权利而建立,而这与封建社会的专制集权是相矛盾的。为了维护这种政体,统治集团不仅着力于控制、掠夺经济的政策筹划,而且需要借助于思想教化的作用,使国家干预合法化、必要化。由此可见,朱元璋容不下孟子的民贵君轻言论,是情理之中的事。不过,这位封建新贵对《孟子》书的删节却造成了两个严重后果:其一,扭曲了中国文人的心态,正如朱维铮所说:“明清君主好讲理学,都旨在将他们不断阉割过的‘孔孟之道’,用来培植士人的奴才精神,使他们成为专制者需要的‘四民之首’。”(同上)其二,从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统治者就在重塑一个国家意识的“儒家思想”,公然删节典籍无疑加快了工程进展,而且这一学术“变性”祸及当今。台湾学者黄俊杰有言:“儒家思想在战后台湾可以分为两个阵营,一是以中小学教科书为代表的‘官方儒学’,它是‘国家政治目标’的支持者,对儒家进行高度选择性的解释,以支持‘国家政治目标’或为政治领袖的言行提供传统文化的基础;二是民间学者或知识分子所诠释的‘民间儒学’,它强调民族文化的认同远过于政治认同。但在战后台湾的历史情境中,‘官方儒学’透过正式教育系统发挥的影响力

大于‘民间儒学’。战后台湾的儒学以两个系统出现的状态,其实是中国儒学史的常例的现代翻版而已。”(《儒学与现代台湾》)

美国有一本畅销 30 年的经济思想史教科书,作者在讲到古代欧洲的经济思想时说:“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圣·托马斯·阿奎那(St.Thomas Aquinas)这样的学者都生活在非市场社会中,在这种社会中,基本经济决策是按照传统和命令而不是由个人,即不受限制的经济主体作出的。结果,这些早期的学者对西方社会思想持续的影响主要不在于他们对市场力量的洞察,而在于他们关于社会规律性质的先见之明。”但是,“像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后来提醒我们有关自然的情况一样,经济学不会突然作巨大的飞跃。它在中世纪是爬行的,但它却是在按正确的方向前进。”(《经济理论和方法史》)以此反观中国古代,由于民间思想的国家意识化,政府控制型经济体制及其观念得到强化,原有的市场化变迁路径被堵塞了,这不仅使孟子等人的思想火花成为历史绝唱,而且使现代市场观念在中国的引入和扎根更为困难。

除了经济思想的发展需要一个过程 and 方向,接下去值得探究的是工业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发生在其他欧洲国家?对此,顾准 30 年前的结论仍不失其价值。在他看来,自由劳动者的存在是资本主义兴起的一个理由,但“就历史现实而论,其他的因素更为确实。所谓其他因素,《共产党宣言》所指明了的,有航海、商业和殖民所扩大的市场,蒸汽机和机器的发明”,对照中国的状况,还必须补充的因素有“法权体系和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国家的商业本位的根本态度;欧

洲古代,加上经过文艺复兴积累起来的科学技术;合理经营(包括复式簿记)的知识;宗教革命,尤其是16世纪英国宗教纠纷中对天主教的深刻憎恶所激起的崇尚节俭积累的清教徒的上帝选民的意识”。因此,“在英国产生出资本主义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单独一个因素都不能达到这种结果”。(《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我们发现,在早期欧洲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中,所有中国封建社会存在的经济弊端——闭关自守、政府垄断、官商勾结、赋税繁重——在那里都存在,也就是说,人的求利本性如果缺乏市场制度的约束,都会导致腐败、不公正和低效率,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有区别的是,在欧洲,经济实体是分散的,弊端的分布也是分散的,每一个经济实体同时在经历试错和学习的过程,当一个国家汇集了各种有利于产业革命诞生的条件时,它便发生了。

这一事例说明在经济的发展中,多样性十分重要,它可以避免整体失误的代价,增加探索成功的机率。同样,经济思想的成长也离不开独立和自由。如果像朱元璋对待孟子那样,国人的市场经济理性是难以培育的。把经济思想局限在一个模子里,同把经济发展控制在几个人设计的框架里一样,风险太大了。

(2004年1月)

上海的经济学家

林毅夫等人在《经济学》(季刊)上有一篇文章,讲到马寅初留美回国 13 年没有出版过一本经济学著作,后来到南方才写出大作,跻身于四大经济学家之列,究其原因,“可能与当时北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南方沿海地区为中国经济重心有关”,他们并且断言:“经济学家只有置身于商品经济特别活跃的经济重心地区才能切身感受到现实经济的推动力,才能敏锐地发现问题,进而加以深入研究。”作为经济思想史研究者,我首先想明确地指出以上说法与事实不符,因为马寅初在来上海前的 13 年中,不仅出版过四册《马寅初演讲集》,而且还发起成立“中国经济学社”并担任社长。其次,经济学研究的水平和经济学家所在区域的经济状况是否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引发了我对上海经济学家性格特点的兴趣。

毫无疑问,在经济学著作的出版数量上,上海的经济学家向来不胆怯,因为在解放前,最有声望的两家学术出版社(中

华、商务)都在上海,这里大学也多,读者面广。但是书出得多是不是等于学术繁荣和研究深入了呢?值得具体分析。胡寄窗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曾这样评价一位沪上著名的经济学教授,说他“从一九二七到一九四四这十八年中共出版了三十五本经济专著,其中仅一九二九年一年就出版了约十三本”,这种情况既表明他的书有一定的市场,但同时也“体现了他的粗制滥造的写作态度”。夏炎德在1948年出版的《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中也对当时上海经济学界的两种治学态度进行了褒贬:一方面,有的大牌教授“著作颇不少,惜大多粗滥,读之味同嚼蜡”,所出论著“大同小异,所谓‘新论’,徒易其名”;另一方面,也有几位“于理论经济学研究甚精”的“纯正之学者”,如复旦大学的唐庆增,“所著《中国经济思想史》,业已完成上卷。彼于中西学均有素养,以著此书,最为合格;虽所据文献中不免杂有伪书,然于此学术空气稀薄之时,终不失为一重要之收获。”对于中央大学经济系的叶元龙,夏炎德除了称赞他“思虑明快,说理透彻”外,还特别提到他“以审慎故,已发表者尚不多见。此种矜持之态度,与一般粗制滥造者迥乎不同也”。

1930年代,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何濂路经上海,碰到留学美国时的同窗,发现这位仁兄非常忙,兼了几所大学的教职,整天坐着黄包车赶场子(那时小汽车尚未普及),问他哪来时间搞研究,写专著,上海教授连说:惭愧!惭愧!原来他出版的教科书只是在美国读书时的上课笔记。我不知道,以严谨扎实从事经济数量统计著称的南开经济学家听了此番表白

会作何感想。

上海的经济学家大多很聪明，也有才气，但理论勇气似乎少了些。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官僚资本大肆侵吞胜利成果，不仅搞“五子登科”，还以外汇管制、黄金国有等手法掠夺民间财富。当时在上海的马寅初大义凛然，一篇《有黄金美钞的不要卖出来》的声讨檄文，让腐败的四大家族出尽洋相。解放以后，南方有卓炯，北面有孙冶方，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进行了独立思考，提出过深刻的见解，但上海已缺少这样的思想者。李平心可能是计划经济时期唯一在经济理论上发表过有争议观点的上海学者，他后来遭到了批判，在动乱中被迫害致死。但他不是专业的经济学家，而是一位历史学家。顾准绝对是个上海人，但他对市场价格调节经济的超前研究是在北京进行的，如果没有孙冶方，如果在上海，顾准的论文能发表吗？何清涟的文笔很犀利，在感情上我也不赞成她对师辈的某些评论。她提到某江南著名学府的一位经济学教授搞了几十年的经济学，唯一的创见是把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剩余价值”概念，转换为“价值剩余”的概念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如果真有此事，确实令人尴尬。

上海的经济学家大约太忙，或者有点世故，所以真正的学术批评就变得稀缺。夏炎德在 60 年前的那部书中认为国内经济学发展缓慢有三个原因：1.“吾国经济学界，犹停滞于接受外来思想之时期，不少学者且视为固然，各以其留学国或师承之学说奉为圭臬，曾不思转而自谋创造。”2.“吾国近年后起经济学者固众，大多倾向于应用方面，如致力财政、金融、货币、

银行、贸易、会计与统计之学，取其与实务有关，堪为个人事业发展之助。其下焉者仅欲博一技之长，以为谋生工具，对于高深学理掉首不顾……此种功用主义之倾向，将使经济学之发展大受影响。”³。经济学著作，“重量不重质之弊，甚为明显。一般著作，大抵平平，其有特殊所见者不可多觐，而一知半解之论，以及似是而非之说，则在所多出。出版界之缺乏鉴别力，学术界之缺少严正批评，实为一大原因。”反观今日的上海经济学界，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时下流行项目课题制，拿到课题便有了钱，也意味着课题成果一定是优质的。因为定重点，下课题，给（出版）资助，评奖项，都是同一拨人，哥儿们互相照应，肥水不外流，于是吹捧之风日盛，平庸之作不绝。至于经济学家的学风品行，大家更是讳莫如深。前两年南开的一批博士生出过一本《中国十位著名经济学家批判》，其中说某位权威“自叹社会工作很多、很忙，早晨还在南疆，下午已到北国”。后生们说得好：“经济学家过于热衷于参与政策，热衷于企业策划，热衷于预测分析是一个误区，甚至很有成就的一些经济学家也未能免俗。经济学家的社会兼职成了经济学家的主业，就像一个农民在别人的园地里耕耘，把自己的园地都荒芜了。这也是经济学研究者的短期行为。”可惜，这样的声音在申城听不到。

相对于外地汉子，上海的经济学家显得有些圆滑。北方有位学者很正统，曾明言萨克斯在俄罗斯进行的“休克疗法”是复辟资本主义，张五常来内地讲演，他眼睛瞪得大大的，反问道：“这样一个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传教士，到中国来的目

的不是明摆着吗？”但这是一种纯真的正统，至少他的观点很公开，你若不同意，可以和他争论，也可以等待实践验证。而上海的经济学家却不，他们的特点是跟风，善变。樊纲是个上海人，他发挥到极致时也闹笑话（如说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写于《国富论》之后，意在表白自己并非求利之徒），但有两个观点十分到位：其一，对于西方规范的市场经济学说，中国人需要借鉴的主要是基础性的理论，引进具体的应用方法倒在其次；其二，“理论家要做的是‘事前’通过理论分析揭示出规律，使人们为即将发生的事做好准备，而不是‘事后’不断修正自己的理论观点”。樊纲从来不属于上海经济学家的群体，他的第二点批评也没有具体的指向，但“不断修正自己的理论观点”的上海经济学人，对此是应该感到心虚脸红的。

不能说上海的经济学家都丧失了独立思考能力，张军关于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表态就很有个性。如关于现代经济学，他写道：目前仍代表着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状况的说法是，“在对待西方经济学的问题上，既不要盲目排斥，也不要盲目崇拜；要吸取其合理的成分，也要剔除其糟粕”，“我们清楚，这样一种研究方式很难提高中国经济学家的研究水平并走向现代化……虽然你很难说它不对，但是它却什么都没有告诉你。”他还说：改革开放以来，“一旦中国的经济学有所前进时，就受到一些人的指责：照搬了！西方化了！盲目崇拜了！等等。这样的指责并不是建立在理论之间的相互竞争基础上的，它不是真正的学术争论，指责他人的人并没有可以与他人相竞争的理论发展出来，而是以不负责任的方式给别人扣上‘帽